

论“古史辨”派史学评价的几个问题

侯云灏

提要 本文阐述了史学界对“古史辨派”史学评论的历史,提出应从“古史辨”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历史使命、“古史辨”寓致用于求真的史学实践以及“古史辨”对历史认识特点的探讨等三个方面,来评价“古史辨”的实践与科学价值。

关键词 古史辨 顾颉刚

本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宛若投石击水,掀起了一场疑古辨伪的古史辨运动。从1926年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七巨册,收入文章350篇,总约325万字。“古史辨”随即成为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史学之代称。与“古史辨”的影响相对应,人们对它的评价也很热烈,可谓众说纷纭,毁誉参半,成为七十年来史学界争论时间最长,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评价的标准至今也未统一起来。本文试图在回顾这些评价的同时,提出几点看法,请史界专家不吝赐正。

一、对“古史辨”评论的历史回顾

对“古史辨”的评论可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阶段。建国前的评论,可简要地归纳为以下几点:

1、赞誉派。可以傅斯年为代表。他称赞“古史辨”“是一切经传子集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而顾颉刚在中国古史研究上的地位,“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①可以说,这是所有赞誉者中评价最高的。

2、批评派。由于批评的内容不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认为“古史辨”的方向有误。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最近几年来时髦的文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并认为这是“避难趋易,想微幸成名”,是“病的形态”,“老是往这条捷径走,史学永无发展。”^②他虽没有提名道姓,但意在批评“古史辨”,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认为“古史辨”的途径不对。如李玄伯说,研究古史有两种依据,一是记载,二

^① 《古史辨》2册297—298页。

^②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

是实物。记载中的资料真伪难辨，“是聚讼多久也不能得到的”。“所以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① 言下之意是顾颉刚在记载上下功夫是走错了路。陆懋德也批评“古史辨”说：“唯知作故纸堆中之推求，而未能举出考古学上之证据，故辨论数十万言而未得结果也。”^②

第三，认为“古史辨”方法失当。其中以张荫麟的批评最为激烈，他指责顾颉刚不恰当地使用“默证”，是“根本方法之谬误”，并在引述了法人塞诺波斯关于使用“默证”的条件规定后说：“吾观顾氏之证论，几尽用‘默证’，而十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③ 如他因为《诗经》中没有尧舜的记载，便断定尧舜后出，殊不知《诗经》并不是专记帝王的史书，这就象从《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去寻找汉代文、景、光武的事迹一样荒唐。

3、否定派。也有两种情况。一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它；一是从“左”的方面攻击它。前一种意见主要来自所谓“信古派”。他们指责“古史辨”是“以空疏的和妆饰的学术迷导青年”^④，顾颉刚“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第就单文只谊矜为创获，鲜不为通人所笑矣。”^⑤ 揶揄嘲笑之态溢于言表。他们甚至说，顾颉刚还应再读几年《说文解字》和清人的著述，才有资格谈“疑古”。后一种意见的代表是马乘风、李季等人。他们以“新史观派”自居，批评“古史辨”违背唯物史观，“没有解释古史的能力”，反而“腰斩史古”^⑥。说“古史辨”提出的都是些“头发梢似的问题，就是解决了也不能使我们明了古代社会问题”，因而是“无花果似的徒劳”。并声称要“把顾颉刚放在批判的屠坛上”，“对于顾颉刚路线加以无情的排除。”^⑦

上引评论虽然只是众多评论中的一小部分，但已看出意见分歧的原因在于评论者多是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和价值观念出发，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和全面衡量的态度。

建国后的评论明显分为两个时期。五十年代，由于一度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搞学术批判，所以这种批判的客观性，说理性便很难得到保障。又由于受胡适的株连，“古史辨”就真的被“放在批判的屠坛上”了，连一些受“古史辨”影响的学者也不得不进行自我清算。批判者大都把“古史辨”上纲为“极端的唯心论”，“抗拒唯物史观的一种巧妙手段”，“阻碍了唯物史观的进行。”^⑧ 因此，“古史辨”的名声一度被弄得很不好，对“古史辨”的研究也就逐渐成了禁区。最近，研究“古史辨”的文章逐渐增多，对它的评价也逐渐接近于客观和公正。但这些评价也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还没有跳出就事论事的圈子，没有从宏观上去认识“古史辨”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没能从丰富当代史学理论的角度去总结和吸取“古史辨”的经验与教训。因此，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仍有深入进行的必要。

① 《古史辨》1册270页。

② 《古史辨》2册369页。

③ 《古史辨》2册271—272页。

④ 《古史辨》1册151—152页。

⑤ 《古史辨》1册218页。

⑥ 李季：《古史辨的解毒剂》，《求真杂志》1卷1期，1946年5月。

⑦ 马乘风：《中国经济史》，1935年中国经济研究会出版500页、498页、493页、499页。

⑧ 《古史辨的阶级本质》，《文史哲》1952年3月号。

二、怎样评价“古史辨”

针对前人评论中的不足，着眼于当前的理论建设，我们认为对“古史辨”的评价应着重于以下三个方面。

1、正确认识“古史辨”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历史使命。

在中国近代，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历史的面貌便发生了新的变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要求变革政治制度的同时，也提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他们把“史学革命”与国家存亡联系起来，大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①从那时起，几代进步的史学家都为完成这一任务作了不懈的努力。可以说，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史学史，就是史学革命的历史。“史学革命”的目标是改造传统史学为现代史学，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个革命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二十世纪初到五四运动，主要是从理论上批判旧史的体系和编史原则，探讨新史的体系和体裁，可称为对旧史的理论批判时期。二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三十年代，重点是用新方法审查旧资料，扩充新材料，可以称为新史建设的资料准备时期。三是从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运用新的历史观解释历史，初步完成了中国通史的科学体系建设，可称为新史创立时期。“史学革命”第三阶段建立新史的任务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完成的，而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任务则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史学家奠定了基础。梁启超当年高举“史界革命”的大旗，以“思想界之陈涉”自居，批判旧史的“四弊二病”，提出写“民史”和“人群进化历史”的主张，是“史学革命”第一阶段的功臣。顾颉刚则与胡适、王国维、傅斯年等人用新方法审查旧史料、扩充新史料，共同承担了“史学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两个阶段成果的基础上，完成建立科学新史任务的。近代“史学革命”的三个环节组成了一个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能截断，更不能去掉任何一环。而“古史辨”就处在这个链条的中间环节。没有资料方面的奠基工作，很难想象在史坛上立足未久，又处于抗战困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能较顺利地完成通史体系的建设，这就是破坏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谈到这两者的关系时，顾颉刚曾很明确地指出：“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集资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用错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下达’。”^②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完全肯定他们在史料整理上，过去固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后如能改变方向，配合着新的科学史观作中国史料的考证，仍有其重大的任务与使命。由此可见，“古史辨”的历史地位不仅已为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的进程所证实，而且也为当事人所承认。不承认“古史辨”的历史地位，将其与近代史学革命相分离，并进行人为的拔高和贬低，都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把顾颉刚比做力学上的牛顿和生物学上的达尔文，固属以偏概全，扬之过高；而无视其贡献，一定要将他“放到批判的屠坛上”，显然是割断历史的做法。

中国近代的“史学革命”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是集几代人无数位史学家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才初步完成的。对于每一位史学家来说，他们只能完成一个阶段，一个侧面的一部分工作，而只要他们作了对“史学革命”有益的事，就应该给予相应的肯定。至于他们具体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② 《古史辨》第4册《顾序》22—23页。

承担什么任务，则是由当时的主观条件决定的。用顾颉刚的话说就是“承受我的时势”，“随顺我的个性”，“不肯错过我的境遇”。^① 顾氏生当“史学革命”开始之时，便自然承担了为建立新史准备资料的任务。然而，史料工作也是多方面的，从考古发掘到记载的整理，应当有许多人分工去做，不能独责一二人作全部的包办。顾颉刚便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了古文献的整理工作，而且是分歧最多、难度最大的先秦文献的整理工作。对此，他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也想一口气把中国古史弄个明白”，但进行了一段工作后，才知道这是“太幼稚、太汗漫了”，所以改变主意：“我不敢普泛的研究古史了，我只敢用全力到几部古书上。”并且声明：“实在，这并非胆怯，如果不自认定了一个小范围去做深入的工作，便没有前进的可能了。”^② 这确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有自知之明的选择。在古文献的整理工作中，他以破坏为手段，以考信为目的，和他的同伴们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七卷九册三百二十五万字的学术成果，不仅为后来者提供了比较可信的史料，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古史人才。这些成绩是与顾颉刚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在一个学术领域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分不开的。应该说，顾颉刚是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第二阶段的一个方面的代表人物，承担着整理先秦文献资料的攻坚任务，他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这就是我们评价“古史辨”的事实根据。如果离开这一基本事实，而用主观臆想的标准去衡量它，例如说它只重文献整理而不重考古资料，只进行史料考订和微观研究而没有宏观把握和解释历史的能力，甚至指责它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等，都是由于不了解“古史辨”的历史使命而提出的过高要求。

这里涉及到一个评价标准问题。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乃至建国以后，都有人主张以唯物史观划线，去评价历史学家或学派。这是一种“左”的看法。殊不知这样一来，许多有贡献的历史学家包括顾颉刚在内，都被划到线外，而所谓近代的“史学革命”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阶段，这岂非名副其实的“腰斩历史”？我们认为，对建国前的史学评价，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对待“史学革命”的态度，对“史学革命”在不同阶段上所承担的任务的态度。这不是否定唯物史观，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运用唯物史观。因为“史学革命”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任务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史学家完成的，我们当然不能以是否赞成唯物史观去评价他们，至于“史学革命”的第三阶段，主要是用唯物史观去建立科学的新史，所以“史学革命”的标准便与唯物史观统一起来了。

2、“古史辨”寓致用于求真的史学实践。

历史学是求真与致用的统一，求真的最终目的是致用，而致用必以求真为基础。由于受政治环境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史学家往往不能正确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表现为一个历史时期偏重致用，另一个历史时期偏重求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中，一些人比较偏重致用，另一些人推崇求真；甚至同一个人前后主张也不一致。这就使史学的发展路线呈现出曲折盘旋的状态。例如乾嘉学派纠正了宋明理学的空疏，十分推崇求真，至其末流，便出现了枝蔓破碎的弊病。近代史家在爱国救亡热潮的推动下，提倡致用的经世史学，又矫枉过正，使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流为政策上的注脚或党派斗争的工具。这些前车之鉴，使顾颉刚开始探索寓致用于求真的治史途径。他认为“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

① 《古史辨》1册《自序》80页。

② 《古史辨》1册272页。

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由于他有着为学术献身的精神，没有狭义的功利目的，所以才能做到无家派，无偶像，没有门户依傍和主奴成见，力求“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①即使对他尊敬的老师胡适，也敢于在《老子》成书的时代问题上提出不同的意见。而他自己也能虚心听取各方的批评，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放弃不正确的假设，表现了汇百川而成大海的气度。不过，顾颉刚并未回到为考据而考据或为辨伪而辨伪的老路上去。他早年受《新青年》等刊物的影响，便产生了“打破传统”的想法，终于将“五四”的反封建精神带到了古史研究领域。他致力于“古史辨”，根本目的是“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②但这一思想并不是外在的，强加给历史的，而是通过“层累说”、“四偶象说”、《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体现出来的。由于顾氏认识到自己的研究目的与社会的发展方向相一致，所以坚信只要“求真”，就能剥掉附在古史记载上面的灰尘，达到反封建的“自然结果”。所以他讲致用而不急功近利、曲解历史，重求真而又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使史学适应于社会的发展。这就在大的方面把致用与求真统一起来，寓致用于求真之中，通过求真显露出史学的致用价值，不仅在史料考订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也推动了古史研究领域的思想解放。如果我们联系到几十年来在致用与求真关系上走过的曲折道路，就更加感到顾颉刚的史学实践有值得借鉴之处。

3、“古史辨”对历史认识特点的探讨

“古史辨”的基本理论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这个理论已接触到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即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和历史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历史认识论是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我们忽视了，直到最近十多年，才有学者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这些学者的看法是：历史实际已经逝去，永远不会再现，后人只能根据史料来认识它。但史料在形成过程中，不仅受观察者的方位、视角、时代等多方面的限制，而且也渗透着记录者的主观成见。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虽然能对这些史料进行审查和鉴别，却同时也打上了自己的时代和价值观念的印记。因此，历史认识本质上是认识的主体（历史学家）、认识的客体（历史实际）、认识的中介（历史资料）三者 in 历史研究科学实践上的能动的统一。由于认识的客体仍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认识的主体又受认识能力和条件的限制，所以历史学家的认识不可能达到完善的程度。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认识范围的扩大，认识方法的改进和认识手段的不断丰富，人们的历史认识就可能由不完善到接近完善。不过，认识的过程也和历史发展一样，不会终结。我们之所以说“古史辨”已接触到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是基于下面三点理由：第一，顾颉刚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古史，古史中渗透着历史认识主体的时代意识，反映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文化风貌。他以对周公的记载为例，认为《尚书·金 》是“鬼治主义极盛时代的产物”，所以那里面的周公便是“一个装神作怪的道士”。到了战国时代，养士之风甚盛，于是记载中的周公便是“进善百人，教士千人，宫朝者万人”，甚至“一沐三握发，一饭三

① 《古史辨》1册《自序》25页，81页。

② 《我是怎样编〈古史辨〉的》，《古史辨》新版第1册28页。

吐哺”，^①成了重视人才的贤者。根据这个认识，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就是“伪材料”也可成为真材料：“许多伪材料，置之于一作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一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②第二，他认为既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古史，所以“古史的真象”已很难考查清楚了：“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③顾颉刚在这里所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对“古史”演变的纵向考察，去掉后人附加在上面的东西，恢复其较早时代的面貌。所以他又说：“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④第三，他认为过去的历史是可以认识的：“我们生于今日，初懂得用历史演进的眼光去读古书”，就能够“从记载中研究出一个较可信的古代状况”，在认识上超过前人。不过，“学问是无穷无尽的，只有比较的近真，决无圆满的解决。”^⑤由此可见，“古史辨”的理论已涉及到历史认识客体的特点，认识主体的局限性和能动性等特点。在六、七十年前就有这样的看法是难能可贵的，他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古史的说法，与克罗齐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历史哲学命题颇有相同的味道，只是前者仍停留在治史经验总结的层面，而后者已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从历史认识论的深层次上加以系统研究而已。顾颉刚常把历史认识问题与古史真伪问题混淆起来，而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又都隐藏在“历史演进的方法”的外壳之下，没有形成历史认识论的独立命题，这是他终生的遗憾，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古史辨”是中国近代史学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成果，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对其中的有益成分加以吸收和提炼，以丰富当代的史学理论。

① 《古史辨》2册73页。

② 《古史辨》3册《自序》7—8页。

③ 《古史辨》1册273页。

④ 《古史辨》1册60页。

⑤ 《古史辨》1册271页。